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 日本诗话中的 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孙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Riben Shihua Zhong De Zhongguo  
Gudai Shixue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日本诗话中的

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Riben Shihua Zhong De Zhongguo Gudai Shixue Yanjiu

孙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孙立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8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1064-2

I. ①日… II. ①孙… III. ①诗话-诗歌研究-日本 ②诗话-诗歌  
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313.072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7086号

书 名: 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孙 立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064-2/I·250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pkuswsz@yahoo.com.cn](mailto:pkuswsz@yahoo.com.cn)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9.75印张 276千字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7.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总 序

在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都堪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她的历史与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山大学(初名广东大学)同样悠久。鲁迅、郭沫若、陈中凡、方孝岳、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等名字让我们回忆起来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后人来说,学科辉煌的历史与丰富的遗产同时也是压力。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固然占了“便宜”,但也像是站在海拔极高之处,每一步攀升都异常艰难。仰望前辈,如何既继承学术传统又有所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当今,“独创”二字已经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流行语。不过,各个领域不同,不同学科有异:有些贵在创造发明,有些偏重发掘发现。有些可能是“独创”,有些则只能是“独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似乎难以以创造发明自诩;形态上的“新”与“旧”也难以用来判断学术价值的高下。所谓“创新”,未必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抛弃。按照清代学者纪昀评点《文心雕龙》的说法,在历代文坛上,“新声”可能成为“滥调”,“旧式”也可能成为“新声”。新与旧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在传统断裂的时代,挖掘与发现传统文化资源,也是颇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学就是传统的学术资源。“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自有体系,此后的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被人所淡忘。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

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更是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以中国“文章学”的观念来“发现”、诠释和演绎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套用西方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这一兴盛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回归本土与本体,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回归到“旧式”那里去。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西哲曾云:“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中国文体学之复兴,为“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作为“新声”的“旧式”已经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文体学相同。我们要站在21世纪的学术高度来研究中国文体学,回到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但又不仅仅是要回到刘勰等古人的理论,同时必须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反映出当代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平与境界。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受到学界认可的学科方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就是近年来我们凝聚力量、重点建设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本学科影响最大的方向之一。同仁们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发表了大量论文之外,还撰写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为了及时反映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是开放与持续的。作者除了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还有其他高校教师与学界同仁。所收成果以中国文体学研究为重点,兼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不断地吸收中国文体学研究成果到本丛书中来,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发展。

吴承学

2010年12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 读《日本诗话中的中国 古代诗学研究》，谈文学文化的流转

近世谈论文学文化，往往受国族边界的规限；国家文学史书写的兴起，与国族主义盛行有绝大关系。今日论文学，即使可以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也不能完全摆脱国家观念的影响；然而近时文学论述又颇有回归往昔歌德“世界文学”的想法，以为文学以各种形式流转传播，丰富了不同的传统。文学的文化样貌，更因为这些流转活动，经受异国地域风俗的淘洗，因而更繁茂多姿，更显生趣。于是跨越边界的文学研究，成为新的风尚。事实上，“中国文学”这一现代概念，或因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一类国族主义文学史流传到中土而彰显；而回顾中国文学的过去，却又曾翻江越海，流播四方，其中东邻日本就受到极大的影响，值得我们从“世界文学”的研究角度予以审视考查。

孙立教授新著《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就是中国文学流转到日本的一个用心的考察。他选取“日本诗话”作为切入的角度，尤其别具深义。“诗话”的源头，以命名方式而言，始于宋代欧阳修；以内容性质而言，更可上溯至钟嵘《诗品》。六一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钟嵘品诗，“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诗话是文人间消遣闲谈的一些佐料，是古代文人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写诗”和“话诗”都只是生活经验的流露。其间当然有人会认真严肃一点，如严羽《诗辨》要作“惊世绝俗之谈”，但从欧阳修《六一诗话》到袁枚《随园诗话》，更多的是适性闲谈的纪录。这种生活经验的载记方式，自有其民族文化的脉络，其移植于另一风土，如何于教外别传，另成系谱，是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史研究的课题。孙教授著中，就细意探析日本诗话的演进过程、书写体制和特色，更特别究心于日本诗话的“本土化”，包括“讲究逻辑性”、“更专门化”

等等现象。

孙立教授著中更有一个重要的论述课题,就是诗坛气运的二百年“时间差”问题。“时间差”是文学文化流转过程最常见的诠释方案,因为流转是一个活动,必然经历一段时间旅程,不同空间的文化现象出现有先后之别,因此很容易得出“落后”地区追赶“先进”世界的公式。现今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论述,就往往依着“先进—落后”的公式进行。孙教授的论述却能摆脱这种简易的“时间差”公式,尤其细论江户明治时期有关唐宋诗之争、因明以学唐等现象,让“时间”因素以更复杂纠结的面貌呈现。以同样的敏锐触觉,孙教授又深入探讨日本诗话中对中国诗歌体制以至历代诗论、诗选的论见;其探析所得,就不单是“域外汉学”的成果,更有从“域外”看“中国”的意义。

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本就需要从多个角度、不同层面去分析研究,孙立教授长年精研中国文学批评,所著《明末清初诗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等,功在士林,在学界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孙教授学养深积,故能钩深挾微,从另一文化脉络剖视中国文学文化的丰富义蕴;在拜读过《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洋洋二十万言后,个人深得启发,受益匪浅,故乐于向大家郑重推荐。

陈国球

2011年11月15日

于八仙岭下



# 目 录

读《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谈文学文化的流转 陈国球 (1)

绪 论 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 (1)

一、中国与日本——诗坛“二百年”之气运 (1)

二、日本诗话的前世今缘 (6)

三、日本诗话的本土化 (12)

第一章 日本诗话与中国文学 (17)

一、中国文学的东传与日本汉文学思潮 (17)

二、日本诗话的演进与中国文学思潮的关系 (30)

三、日本诗话的体制与特色 (41)

第二章 《济北诗话》与宋前文学 (59)

一、诗论主旨及其来源

——适理、性情之正、童子之心、醇全之美 (60)

二、论宋前诗人 (65)

三、对诗的品鉴 (73)

四、论和韵诗 (78)

五、小结 (85)

第三章 江户明治时期的唐宋诗之争 (87)

一、日本唐宋诗之争的大势 (87)

二、“明犹唐也”与明人的“优孟衣冠” (93)

三、“宋之俗臭”与“宋之清新” (102)

四、小结：维护诗之正体与维护诗之性灵 (125)

|                            |       |
|----------------------------|-------|
| <b>第四章 江户诗话论明代文学</b>       | (129) |
| 一、明诗的“初盛中晚”                | (130) |
| 二、论明人的学唐                   | (136) |
| 三、明代诗人优劣论                  | (142) |
| 四、论明文                      | (151) |
| 五、小结                       | (156) |
| <b>第五章 日本诗话论中国文学批评</b>     | (158) |
| 一、论中国历代文学理论                | (158) |
| 二、论中国古代选本                  | (191) |
| 三、20家日本诗话所引中国诗学著作表         | (207) |
| <b>第六章 日本诗话论中国诗体</b>       | (221) |
| 一、诗体总论                     | (221) |
| 二、诗体分类                     | (231) |
| 三、诗体分论                     | (242) |
| <b>附录1 日本诗话论中国诗人诗作资料选编</b> | (262) |
| <b>附录2 日本诗话作者小传</b>        | (282) |
| <b>引用书目</b>                | (299) |
| <b>后 记</b>                 | (306) |

## 绪 论

# 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

## 一、中国与日本——诗坛“二百年”之气运

在日本学界,有一个很有名的有关中国文学影响日本文学二百年时差的说法,首倡者是 18 世纪的著名汉诗学家江村北海。其后有不少人引用这一说法,有的赞同,有的予以补正。揖斐高属于后者,他在《江戸の汉诗人》这篇文章中的“诗风的变迁”一节中,引述并解析了江村北海的观点:

《日本诗史》(1771)的作者江村北海,回顾了一千多年来汉诗的变迁。在该书的第四卷,论述了中国本土以及日本诗风变迁的特征与关系:

“夫诗,汉土声音也,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而诗体每随气运递迁,所谓《三百篇》,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自今观之,秩然相别,而当时作者则不知其然而然者,其运使之非耶。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

由于地理上有大海相隔,日本的诗风追随中国本土诗风存在着 200 年的时间差。这是北海提出的一个极其宏观的假定。

但是,从《日本诗史》的行文来看,北海的这一假定,是根据日本汉诗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实而设定的。这个历史事实就

是18世纪之后,给日本汉诗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北海所生存的时代依然留有余温的,荻生徂徕(1666—1728)及其门人,亦即萱园学派所提倡的古文辞格调派诗风的流行。萱园学派的诗风是从中国盛唐时期的诗中去追寻诗的理想,他们模仿盛唐诗的格调,是一种仿古主义。萱园学派的方法、立场,直接来自于中国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李于鳞、王世贞所主张,并在当时流行的古文辞学的影响。之后,北海依据其假定,认为日本萱园学派诗风能在元禄年间(1688—1704)风靡日本一代,不是别的,正是上述文学的(二百年)“气运”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他认为:“我们的元禄时代距离明朝的嘉靖正好是200年。”<sup>①</sup>

从揖斐高的分析来看,他认为,江村北海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是基于他对18世纪日本汉诗界盛行明代复古主义格调诗说的判断之上。从明嘉靖年间(1522—1566)李攀龙、王世贞接续前七子复古主义学说,到18世纪初(1711)荻生徂徕成立萱园诗社,接受李、王的复古学说,以盛唐诗为学习对象,推行古文辞学,形成学习唐明之诗的热潮的数十年时间,其过程恰好约二百年。

江村北海的依据或是基于他对18世纪日本汉诗坛与明嘉靖年间文学复古主义之间关系的判断,但实际的情况应该更早。奈良时期甚或更早的白凤时代,中国的魏晋六朝文学就对日本宫廷贵族文学产生影响,这是日本文学面向中国最早的表现。如以影响的时间来计,从中国魏晋文学传入日本,到奈良时期日本宫廷文人模仿中国文人曲水流觞,酒会赋诗,其间有四五百年的时间。如就《文选》传入日本后到发生影响,直至编成《怀风藻》,则有二百余年的时间。因此,越是在早期,由于交通、交流的限制,影响的间隔越长。从四五百年到二百年,时间愈来愈短,影响越来越快捷。至江户时期,中国书籍输入日本,多而且快。这不仅表现在

<sup>①</sup> 揖斐高:《江戸の漢詩人》,諏访春雄、日野龙夫编《江戸文學と中國》,每日新闻社昭和五十二年(1977)版,第77页。

中国旧有书籍的输入,新刊书籍七八年后即传入日本的情况十分常见,最快的次年就传入日本,对日本读书人接受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日本汉文学也在日趋便利的文化传输中受益,在江户后期,日本汉文学几乎能与在中国文学思潮同步平行发展。虽然其间中日两国政府考虑到国家安全及贸易问题,对通商有阶段性的限制,但总体而言,江户以来,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信息的传播远较以往方便,对日本文学思潮的世代更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二百年还是七八年,相较于中国文化,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一个文化后进国是无疑的。面向中国,是日本文学自奈良开始就形成的格局,这也是由日本文化的后进性所决定的。日本九州的长崎,是中国与日本重要的通商口岸,书籍也大多借由这条港口上岸。

长崎镇,华夷通交转货处,故士民富饶,家给人足,治平日久,渐向文教。加之清商内(衍文)崇尚风雅,善诗若书画者,往往航来。沈燮庵、李用云、沈铨、伊孚辈,不遑缕指,故余习之所浸染,诗书画并有别致。<sup>①</sup>

这段话描述了长崎这个地方不仅经济发达,士民富饶,而且倾心于文教。于是清商中崇尚风雅者,在商货交易的同时,也夹带沈燮庵、李用云诸名家诗、书、画至长崎,通过售卖,获得额外利润,同时使长崎人受到文教滋养。

中国文化、文学对于日本的影响和作用,在日本读书人中是有共识的。原尚贤说过:

苟学孔子之道,则当以孔子之言为断;为文辞者,苟效华人,则当以华人为法。<sup>②</sup>

① 田能村孝宪:《竹田庄诗话》,《日本诗话丛书》第五卷,株式会社凤出版社昭和四十七年(1972)版,第575页。《日本诗话丛书》所收诗话有以中文撰写者,也有以日文撰写者。本著凡引中文部分用凤出版社昭和四十七年(1972)版,不再特别说明;凡引日文部分用文会堂大正九年(1920)版,注明和文版。

② 原尚贤:《刻斥非序》,《日本诗话丛书》第三卷,第133页。

因此,习汉诗者,无不以拥有汉诗集为幸,日人购买汉典的欲望强烈,中国汉籍也通过多种渠道流入日本。有关中国典籍在日本流传及存目的情况,中日学者有专门的研究。在大陆地区,早期的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在日本的流传》(《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其后有更多的相关著作面世,如严绍璦《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严绍璦、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陆坚、王勇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严绍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宝平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勇、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第九册(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仁生《论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在日本有关江户时期的著作有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版),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舍1984年版)等,均为其中重要的成果,其中也多有涉猎文学典籍的。

上述的相关研究,不再赘述。本文所关注的,是日本诗话中所记录的中国文学书籍传播及发挥影响力的情形,以与上述内容相补充。数百年来,流入日本的汉诗集众多。在这些汉诗集中,以题名李攀龙的《唐诗选》影响最大,有人称它是“养成日本人中国文学教养与趣味的重要部分”<sup>①</sup>。但这部书,实际上是部伪书,并非由李攀龙所编刻,而是明人根据李攀龙的《唐诗删》重新编辑整理而成。在日本经荻生徂徕的推荐,广受欢迎。日野龙夫在服部南郭《唐诗选国字解》的卷首《解说》中推断,服部校订的和刻本《唐诗选》,自享保九年(1724)初版以来,至万延元年

① 服部南郭:《唐诗选国字解》卷首日野龙夫《解说》,平凡社1982年版,第1页。

(1860)的130余年中,最少出了14版,册数近10万<sup>①</sup>。一本书盛行了130多年,而且其间还经历了宋诗派流行的数十年,说明这本诗集在日本的高度需求和受欢迎的程度。

到江户后期,为适应日本汉诗界对唐宋诗之争的讨论,明末清初的书籍需求很旺。加藤良白在诗话中说:“近时明末清初之书,盛行世。”<sup>②</sup>我们从当时文人讨论中所引用的书籍看,袁宏道的《袁中郎集》、陈子龙的《皇明诗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渔洋诗话》以及稍后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都屡被提及,正好印证了加藤良白的说法。说明即便是在明治维新的前夕,文人对中国文学典籍的需求仍然旺盛。从明末清初(即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到加藤良白《柳桥诗话》的发行(1836),其相差的时间也差不多是二百年左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二百年的时间差,不是指书籍传至日本的时间,而是其发挥影响力的时间。因为江户以来,如仅就书籍的传播而言,非常快捷,有的新刻书籍次年就传到了日本。

书籍传播的加快,当然也意味着影响力的发挥有可能突破二百年的限制。在江户中后期,日本人已大致了解同时期中国诗坛的名流巨擘,并希望通过特殊的途径得到中国名诗人的青睐。加藤良白说:

昔者,长崎诗人高彝重赂商舶,投诗卷于沈德潜,乞求制序,德潜不许。商人计穷,遂使么魔代“大匠”,凡德潜以下一时名士数人(王鸣盛、钱大昕、赵文哲、王昶、来殷氏、黄文蓬等,凡六人)假托赍来,大抵七古大作也。细读之,虚誉溢美,靳侮可憎,然高彝不悟,奉为拱璧。燕石之诮,人口藉藉,其事备见原温夫《诗学新论》。或曰:东里之鱼,泣于鼎镬。何独咎于彝?且近时清商所赍来诸货,何物非膺?不独诗已。<sup>③</sup>

① 服部南郭:《唐诗选国字解》卷首日野龙夫《解说》,第17页。

② 加藤良白:《柳桥诗话》卷下,《日本诗话丛书》第六卷,第460页。

③ 同上书,第424—425页。



这则记载,说的是长崎诗人通过清朝商人向沈德潜求序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让中国人觉得不光彩、十分汗颜的事情,当时的清商为牟利,常拿一些伪造的清代名人题序或书札一类的东西蒙骗日本人。加藤说,不独诗文,连近时清商输日货物,都“何物非膺”?真令人情何以堪。这种行为当然令人不齿,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它无疑也反映了日本人对中国名诗人的仰慕甚烈,希望得到引荐的心情已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同时也说明,清中叶(相当于日本的江户中后期)以后,借由商人,日本诗人可以和中国诗人进行直接的沟通。不论沟通的结果如何,都反映出彼时中日两国在文学交流的方面,已远远突破了二百年文学气运的说法。

正如揖斐高所说,二百年的文学气运说,依据的是18世纪的文学现象。18世纪以前,时间差或不止二百年,其后,则无须二百年。因此,从宏观的、阶段性的因素考虑,二百年说有道理。从微观的、全局的角度而言,则不能涵盖所有的中日文学交流与影响的现象。当然,江村北海的二百年说,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也不一定符合18世纪以后的所有状况,但这一说法有影响,说明它有部分的道理,揭示了日本文化、文学接受中国影响的一种现象、一个局部的规律。

## 二、日本诗话的前世今缘

面向中国,不仅是日本文化、文学的主动选择,也是日本诗话不得不然的选择,这就是日本诗话的前世今缘。

在中国盛唐时期,著名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留学”回国后,将他带回日本的流行于中国的诸多诗论著作重新编辑成《文镜秘府论》,这是最早对中国诗论进行关注的、由日本人编辑的诗论著作。但它对日本人的作用仍与其他中国书籍一样,只是起到了汉诗知识的传播,而有助于日本诗论的建构。

完成于14世纪初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是由日本人写作的首部诗话。师炼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南宋末祥兴元年(1278)至元朝的至正

六年(1346),他阅读过不少中国宋人的诗话和笔记。在书中,引用过梅尧臣论诗之语和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内容,提到过《古今诗话》、《庚溪诗话》、《苕溪渔隐丛话》、《遯斋闲览》等宋人诗话和笔记。考虑到《苕溪渔隐丛话》是一部诗话丛书,所以虎关通过此书读到了更多的宋人诗话。可以说,《济北诗话》从书名到内容,都可以看到其所受中国诗话的影响。如果说《文镜秘府论》还只是丛撮中国诗论话语的话,《济北诗话》则在接受中国诗话体例的同时,在内容上对中日两国的诗人、诗作也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其中对杜诗、陶诗的研究,既受到宋人重视杜、陶的影响,也有自己独到的成果。尤其是他对杜甫的推荐,开启了五山文学的一代风气。他对和韵诗的研究,在中日两国而言,都处于领先的地位。虎关是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家中最早的奠基者,也是最有创见的研究者之一。《济北诗话》主要以中国宋以前的诗人诗作为评析对象,虽然偶有涉及日本僧人诗作,但数量极少,与后世日本诗话形成差异。

日本诗话的繁荣,是从江户宽文七年(1667,清康熙六年)开始的。这一年,继《济北诗话》后,出现了第二本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诗话,林梅洞的《史馆茗话》。此后,直至大正二年(1913),约250年的时间里,共出版发行诗话100余部,其中辑录在《日本诗话丛书》中的有62种。如以250年的长度去衡量,似乎两年多一部。但实际上日本诗话的撰写基本集中在江户时期,明治以后的诗话已经很少。研究日本诗话在江户时期的繁荣原因,学者指出了多种因素,如:江户的元禄、享保时期,儒者生活贫困,汉诗文可以成为他们卖名的工具和生活的的手段,编写诗话以作为一种商业手段营利;编写诗话以教育门生弟子;编写诗话以宣扬诗学主张并攻击论敌<sup>①</sup>。以上总结的三条原因,笔者均深为赞同。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在此期才得以具备。一是从江户时期开始,有了专职的儒者、文人。儒学和古文辞业不仅是爱好,更是一种职业。广濑范曾忆及其父广濑建作《淡窗诗话》的情形:

<sup>①</sup> 参见祁晓明《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0页。